一、“秀才”当了兵

爱读野史爱反抗的农家少年

1893 年 12 月 26 日，在湖南韶山冲上屋场一栋当地人称作“一担柴”式的农家大屋内，诞生了一代伟人毛泽东。

距今刚好 110 年。

把这一个世纪的中国称作“毛泽东的时代”，是一点也不为过的。毛泽东给这一世纪的中国带来了太多的变化。他将一个贫穷积弱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独立自强的新中国；他彻底打碎了旧中国持续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与封建军阀的统治基础，建立了由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新社会；他将盘踞在中国大地上的外国侵略者统统横扫出去，撑起了一片中华民族的朗朗乾坤。

毛泽东，作为中国 20 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人物，兼具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和诗人的气质风采于一身，而他一生最大的贡献仍然在军事方面。1963 年，毛泽东与外国朋友谈话时说：我这一辈子就是在打仗中过的，共打了 22 年。从没有打仗的决心到有打仗的决心，从不会打仗到学会了打仗。1975 年，已到耄耋之年的毛泽东，仍然豪气十足地对德国总理施密特说：我也不会写诗，但我懂得怎样打仗，怎样打胜仗。

对于这样一个以会打仗，并懂得如何打胜仗而自豪的伟大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物，我们从他的少年时代能够发现一些什么样的端倪呢？

毛泽东的童年生活并非是轻松快乐的乐章。他是在不断地“反抗”与“斗争”中走过来的。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不断地发展着”。①

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生于 1870 年，于 1920 年去世。毛顺生终身务农经商，是个生财有道的中国农民。毛顺生带着一家人勤奋劳动又省吃俭用，家里没有吃闲饭的，小孩子喂猪，大孩子下地干活。每年口粮之外的剩余谷子，用作押进田产，取利息钱，还兼作贩运谷子和生猪的生意。开始是小规模的，随着资金的积累，毛顺生就到湘乡太平街一带成批购进稻谷加工销售，并逐步由肩挑改为土车运送，直至发展到从银田寺雇船装运白米，运往湘潭附近出售。家里雇了一个长工，冬天碾谷的时候，还得多雇一个短工。毛顺生还贩卖耕牛，购买土地，一来二去，资本增加到两三千元，于是他在韶山冲里已经是个颇为富裕的人家了。

对于孩子们来说，毛顺生是个性情十分暴躁、封建专制的人。他一心想把孩子们培养成像他一样能够勤勤恳恳、精于算计、发家致富的人。他对孩子的教育经常采用训斥与责打的方式，父子之间很少有感情的交流。尽管毛顺生后来也将自己的儿子毛泽东送到了县城乃至省城去“深造”，并最终成就了毛泽东少年时代的良好教育。但是，由于毛顺生的教育方式简单、粗暴，并不常向孩子们表露内心的真实情感，故而直到他去世十几年以后，毛泽东与斯诺谈起自己的身世时，想到的仍然是父亲性情暴戾的一面。

毛泽东对斯诺说：“他是一个严厉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可记，他就叫我去干农活。他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常常打我和我的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而且给我们吃最次的饭菜。他对雇工们作了让步，每月逢十五在他们吃饭时给鸡蛋吃，可是从

①《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 7 页，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来不给肉吃。对于我,他既不给肉也不给蛋。”①

也许恰是继承了父亲的部分性格，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性情顽梗倔强,争强好胜,绝不循规蹈矩 而毛泽东性格的另一面,强烈的同情心、怜贫憎富与乐善好施，则可能来自他母亲的性格遗传。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是一位善良的农家妇女。她没有读过书,连个像样的大名都没有,因她在文家排行第七,大家都称她‘七妹”。毛母性情温和，乐于助人，有着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毛泽东在回忆中说:“我母亲是个仁慈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她同情穷人，并且当他们在荒年里前来讨米的时候，常常送米给他们。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②

少年毛泽东的家里分成了两‘党”,父亲是‘执政党”,母亲与毛泽东及其弟弟们组成了“反对党”。毛泽东坚决站在母亲的一边，不仅跟着母亲信过佛，而且也学着母亲周济穷人。不过，在“反对党”的内部，政策是有分歧的。毛泽东的母亲主张采用温和的方法,与他父亲的一些不良的行为作‘斗争”。毛泽东说:“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她批评任何公开动感情和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③ 故而,毛泽东的家庭‘斗争’始终也能贯彻‘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方式,斗而不破。

毛泽东 8 岁进私塾,10 岁那年，他带领同学私下去游泳。先生知道后，要在课堂上惩戒他们。毛泽东却当众引《论语》上的话，“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说孔夫子是赞成洗冷水澡的。先生被弄得下不了台，就到上屋场找毛泽东的父亲发火说:“你家润之不得了了,他才学比我高,我教

①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 3 页,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②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 6—7 页,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③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 7 页,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

不了啦。”

毛顺生一听儿子竟敢与老师顶嘴,坏了学堂的规矩,不免恼火,顺手捡了根楠竹丫子冲向私塾,看见儿子就劈头盖脸地打去。毛泽东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一溜烟跑了。晚上也不敢回家,怕继续挨打,于是就顺着县城的大致方向走去,想像着县城就在什么地方的山谷里。他在山里转了三天,最后被家里人找到了。他这才知道,走了三天也还是在离家八里路的光景兜圈子,并没有走出韶山冲。

这大概是毛泽东第一次有意识地要冲出家乡,了解外面的世界。尽管他没有找到他心目中认为更加发达文明的县城,但他却尝到了“斗争”胜利的甜头。他说:“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况会有点改善。我父亲稍微比过去体谅些了,老师的态度也比较温和些了。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是一次胜利的‘罢课’呵。”①

10岁时的“叛逆”与“斗争”,就让毛泽东获得了特殊的人生体验,使他终其一生都在追求这种胜利的喜悦。

随着年龄的增长,毛泽东对于父亲的反抗逐渐升级。有一次,毛顺生设宴款待生意场中的客人,要儿子出来殷勤待客,儿子讨厌繁文缛节,毛顺生便当着客人的面责骂他“懒而无用”。毛泽东立即与父亲争吵起来,并引用经书中“父慈子孝”的话来暗示,因为父亲的不慈,故而他也没有必要孝顺的道理,令其父在客人面前“颜面扫地”。毛顺生更加恼火,操起家伙要打毛泽东,毛泽东赶紧逃跑,父亲气得在后面紧紧追赶。跑到一个池塘边,毛泽东停下来,吓唬父亲说:“你再迫近一步,我就投水了。”

双方提出了“和谈”条件,父亲要他道歉并磕头认错,儿子则要求父亲答应不再打他,然后可以跪一只脚磕头。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

①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6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①

当我们着手描绘这位在中国现代战场上叱咤风云、挥洒自如的伟大人物时，这些童年时代的经历和性格也许会让人们产生一些必然的联想。他在战争中百折不挠的大无畏斗争精神以及在适当的时候善于运用“妥协”的才能，也许于此可以看出一些苗头。

毛泽东一共读过六年私塾。1902 年，在韶山南岸私塾，启蒙老师邹春培，1904 年转韶山关公桥，塾师毛咏生。在这两处，毛泽东从读《三字经》开始，继而读《幼学》、《论语》、《孟子》和《诗经》等。1905 年至 1906 年夏，毛就读于韶山桥头湾、钟家湾的塾师周少希，1906 年秋，转学韶山井湾里，师从毛宇居，读过《春秋公羊传》和《左传》。此后，毛泽东有近三年停学在家，白天同长工一起劳动，晚上帮父亲记账。1909 年秋至 1910 年夏，毛泽东又到韶山乌龟井、东茅塘复学，师从毛简臣、毛麓钟两位先生，读了《汉书》、《纲鉴易知录》，以及许多时论和新书。

毛泽东后来曾说过：“我过去读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② 就从毛泽东在与父亲、塾师的争论中常常引用孔夫子的话来批评对手，我们也可以看出，毛泽东虽说‘不懂’孔夫子，可也拿来当做‘斗争武器’用呢。

少年时代的毛泽东不喜欢这些经书，据他的塾师毛宇居回忆，当时毛泽东在他那里读《春秋公羊传》和《左传》，却喜欢看《精忠传》、《水浒传》、《隋唐嘉话》、《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野史小说。毛泽东自己也说：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

①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 8 页，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② 1964 年 8 月 18 日，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①

这些少年时代读过的书，对毛泽东的一生的确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应该说，他的最早的军事知识是从这些书中得到的。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军事文化是其中光彩夺目的一部分。中国从夏代至明代发生战争 3000 余次,清代及近现代战争也很频繁，而中国人有重史的传统，史书对于历代战争的记述相当详实，并且战争内容常常是史家笔下浓墨重彩的部分，故而军事文化对于中国的影响是极为广泛而深刻的。

近代文化名人梁启超曾说过:"昔人谓《左传》为相砍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砍书也。'② 所谓' 相砍书 '者,即描写战争的书也。

除却史书,中国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四大文学名著中,就有两本《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描写战争的,另一本《西游记》说的也是神仙世界的战争，其中不乏谋略与伎俩。中国人的文化渊源中有着深厚的军事文化根基。

对于毛泽东,人们总是惊异于他没有进过任何的军事学校,并且也没有接受任何较为系统的军事教育，他为什么能如此从容地带兵打仗,并且一举成为 20 世纪中国以至世界最为杰出的军事家？事实上，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来源于战争实践，同时也主要地来源于中国军事文化。毛泽东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使他同时获得了

①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 8—9 页,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② 梁启超《中国史革·中国史界革命案》。

厚实的军事文化的滋养。

在毛泽东后来写下的许多军事巨著中，引用了大量传统经书与野史小说中的故事来说明军事问题。在《论持久战》中提到的“曹刿论战”、“晋楚城濮之战”等战例，都出自《左传》；“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战例，则是《三国演义》中的精彩笔墨。毛泽东还以宋襄公不肯半渡而击，结果败于楚军的事例，嘲笑了迂儒“蠢猪式的仁义道德”，阐述了对付敌军出其不意、战而胜之的指导原则。他还引用“八公山上，草木皆兵”① 提出了“示形于敌”、“兵不厌诈”的用兵方法，以“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② 来说明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在《矛盾论》中，毛泽东举了《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的故事，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并进而提出了作战指导中“知己知彼”的指导原则。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他举了《水浒传》中“景阳冈上的武松”，谈了战略上藐视敌人的道理。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引用《战国策》上的名言“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来说明歼敌与占地的辩证关系。

所有这些都说明，毛泽东在少年时代所学习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一些野史小说，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最早的思想源泉。

学不成名誓不还

毛泽东作为一名伟大的军事家，首先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他在作战指挥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战争全局的深入洞察力和驾驭能力，以及卓越的战略思维能力，是与他作为政治家的杰出才能与作为哲学家的超凡思想能力密不可分的。毛泽东走出私塾以后的求学生涯为此奠定了基础。

① 《晋书·苻坚载记》。

② 《礼记·中庸》。

1910 年秋至 1911 年冬近一年多的时间内，毛泽东走出韶山冲来到当时比较时兴的新式学堂学习比较现代的文化知识。这段时间大大开阔了青年毛泽东的眼界，使他更多地了解到中国与世界的历史与现状，初步确立了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雄心壮志。

在经过了六年私塾学习以后，毛泽东的父亲准备让他到湘潭县一家关系不错的米店去当学徒，以备将来继承自己的家业。如果毛泽东是一个顺从的孩子的话，那么，也许中国现代的历史就将是另样的面貌了。

这个时候，他已有了他的父亲怎么也想不到的更加远大的目标了。毛泽东说:"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我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甚至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它叙述了日本占领台湾的经过，朝鲜、越南、缅甸等国被外国侵占的情况。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①

其时,恰好毛泽东的表兄文咏昌告诉他,湘乡县开办了一所东山高等小学堂,这是一所新式学堂,在那里可以学到许多新鲜知识。于是,毛泽东动员了母亲、舅舅和表兄、老师等人,一同来做父亲的思想工作,最终使得父亲答应了他去湘乡东山小学堂学习的要求。

1910 年秋天，毛泽东离开韶山，去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开始了他一生中第一次有意义的地域转移。即将走出乡关的毛泽东，兴奋地给父亲留下了一首诗，这首诗由日本诗人西乡隆盛的诗改写而成：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①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 13 页,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诗中的豪情壮志溢于言表。第一次走出家乡的毛泽东，似乎已经开始走向了人生的大目标。不知他的父亲是否能够从这首诗中领悟出，毛泽东已经不太可能是那 20 几亩地的继承者了。不仅如此，连毛泽东的两个弟弟后来也走上了与他相同的道路。

湘乡的东山小学堂是一所当时在乡村中不多见的新式学堂。毛泽东在那里学习了新的西方学科和自然科学，如中外文学、历史、地理以及算术、英文、绘画等新文化课程。

毛泽东在这里增长了不少知识。他说：“关于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记载使我着迷，我读了许多有关他们的书。同时我也学了一些外国历史和地理。在一篇讲美国革命的文章里，我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个国家，里面有这样的话：‘经过八年苦战，华盛顿获得胜利，并建立了他的国家。’在一部叫做《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俄国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威灵顿、格拉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①

毛泽东提到的这本书叫《世界英雄豪杰传》，是从他在东山小学的朋友萧子暲（即后来的著名作家萧三）处借来的。他在还书时，曾对萧发表了一番感慨：“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高丽、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中国积弱不振，要使他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八年艰苦战争之后，才得到胜利，建立了美国。”②

在东山小学堂，毛泽东因为能够写出一手好古文，获得了许

①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 16 页，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② 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第 26 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0 年版。

多教员的喜欢与赞扬。他在那里先后写过《言志》、《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作文。他的国文老师在阅读了他的作文以后,批道:"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

在东山求学的毛泽东,不仅有了救亡图存的理想,同时也在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当时他所能找到的道路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

其时,虽说已进入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孙中山的革命武装斗争已在东南各省如火如荼地展开,但在湖南,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思潮仍有很大的市场。湖南是维新改良派兴盛的基地。甲午战争以后,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推行维新改良思想;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则担任了上海《时务报》的主笔。梁启超利用《时务报》宣传变法维新思想。他的文章以笔锋常带感情的风格和通俗流畅的文字,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极大影响。《时务报》在八个月间行销万余份,"为中国办报以来所未有",梁启超也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维新思潮随之激荡全国。维新运动失败以后,梁启超又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继续其改良新民的宣传工作。

正在东山小学堂求学的毛泽东,一时便沉醉在资产阶级维新派所宣传的政治学说里。毛泽东说:"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其中一本叫做《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那时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①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长篇论文《新民说》,其中包括《论新民为中国今日第一急务》、《释新民之义》、《论公德》、《论国家思想》等十数篇。《新民说》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引起

①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 15 页,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了巨大反响,梁启超也因此再度成为舆论界的“骄子”。在其《新民说》中,梁启超总结了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认为“: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则政息焉”,所以“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① 梁启超的这一思想在重视改革运动的思想启蒙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

1911 年春天,毛泽东随同自东山小学堂赴长沙任教的贺岚岗老师来到了长沙,经过老师的推荐,顺利地考入了湘乡驻省中学。在那里,毛泽东对于政治运动的热情更加兴奋与强烈了。因为,长沙作为湖南的省会,各种政治消息自然传播得更快更多了。

1911 年 4 月,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毛泽东从长沙的报纸上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深为革命党人的牺牲精神所感动,遂在驻省中学的墙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他说“:我是如此地激动,以至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这个政见却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孙中山和他们之间的区别。所以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②

在这一时期里,毛泽东不仅承梁启超的名号“任公”之后,自取笔名“子任”,而且在文章的行文笔法之间模仿梁启超。可见当时的毛泽东受到康梁影响是非常深刻的,直至后来他在湖南搞自治运动以及组织“新民学会”等等,都与这一时期的思想有很大的关联。

① 梁启超《饮冰室全集》卷一,第 2 页。

②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 18 页,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从湘乡到长沙的一年多时间里，大大开阔了毛泽东的政治视野。他开始关注中国的政治大舞台，并试着参与其中。其后在长沙的政治运动中，毛泽东逐渐成了显著人物。维新思潮的影响，为毛泽东开启了一条通向五四思想解放运动以至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道路。

这对他的一生，特别对其军事生涯有着怎样的影响呢？毛泽东成了一位始终坚持政治大目标的军事家。他在建军和战略理论中,始终将政治目标放在第一位,用党的政治纲领、方针来指挥军队的军事行动,并注意对士兵的思想教育工作,着重思想建军的基本方针。这些都与他在青年时期所逐步形成的思想方法以及新民理念有着一定的联系。

决定参加正规军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的成功,像一声平地而起的春雷，震醒了中国大地。

早在武昌起义以前，湖北、湖南两省的革命党人就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他们互相约定，无论哪方率先起事，另一方必在十天内起兵响应。一开始，湖南的新任巡抚余诚格还扣押了武昌起义的电报，并不准在报纸发表消息。过了两三天，毛泽东到城外兵营里去看望一个同乡，才知道武昌起义的消息。

一天下午，湘乡驻省中学来了一位武昌的革命党人。他在讲台上慷慨陈词，痛斥了清朝政府的昏庸误国，懦弱无能，主张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接着，他又向老师和同学们介绍了武昌起义的经过，分析了目前武汉三镇的军事政治形势：湖北的新军虽然站到革命这一边来了，新军将领黎元洪就任了湖北省都督，可是，北京的朝廷却起用了北洋大臣袁世凯，叫他挂上了湖广总督的头衔,带领着冯国璋、段祺瑞这两员北洋大将,兵分两路,水陆

兼程,向武汉三镇扑来。湖北的局势十分危急。因此,他呼吁一切革命分子和爱国志士,赶快行动起来,援救湖北起义军,以完成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革命大业……

毛泽东说:"听了这次演讲以后四五天,我决心参加黎元洪的革命军。我决定同其他几位朋友一起到汉口去,我们从同班同学那里筹到了一些钱。听说汉口的街道很湿,必需穿雨鞋,我就到驻扎在城外的军队里的一个朋友那里去借雨鞋。我被驻军的卫兵拦住了。那个地方已经显得非常活跃。士兵们第一次领到子弹,正涌上街头。"①

10月22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率领会党,联络新军起义,向长沙城发起进攻。清朝驻长沙的巡抚余诚格闻风逃跑,起义军顺利占领长沙。于是,革命党人和士兵们组织了湖南军政府,推选焦达峰和陈作新分任正副都督。30日,湖南的立宪党人又策划了一起政变,杀害了起义元勋焦达峰和陈作新,重新推举谭延闿当上了都督。

既然湖南也有了革命军队,于是,毛泽东等人便不用跑到湖北参军,就在湖南参加军队就可以了。毛泽东说:"这时,很多学生都参加了军队。一支学生军已经组织起来,在这些学生军里有唐生智。我不喜欢学生军,我认为它的基础太混杂了。我决定参加正规军,为革命的成功尽力。当时清帝还没有退位,还要经过一个斗争的时期。"②

武昌起义以后的学生参军风潮在响应起义的各省都很兴盛。这是真正的"秀才"当兵,每个人的经历都反映着个人的特点。实际上,"秀才"当兵不是一件容易事。

①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9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②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2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0 年代，毛泽东参加重庆谈判的时候，郭沫若到机场迎接毛泽东，后来毛泽东又在重庆多次会见郭沫若，与其共商和平建国大业。两人于谈话之间，毛泽东曾对郭沫若说“：你的《反正前后》，就像写我的生活一样。”

郭沫若与毛泽东只相差一岁，也都是武昌起义时的热血青年。《反正前后》是郭沫若于辛亥革命以后写的一本自传体的散文，其中也写到了他当时作为进步学生准备参加新军的事情。

郭沫若在《反正前后》中写道“：兵变后的第二天，成都的学生界发起了一个组织学生志愿军的运动。以武备学堂为中心，凡是志愿者都到那儿去参军，略受训练便要到街上维持秩序。我也自告奋勇地参加了，那是兵变后的第三天。我把我的行李也搬进了武备学堂。’不过，郭沫若最后没有当上兵，原因是，他到武备学堂一看，寝室里的床窄窄的只能容下一个人的身子，这样的床怎么能睡觉呢？于是，郭沫若的思想里产生了斗争“：要当志士便要受这样的苦！这怎么吃得消？于是志士的招牌立地折下来了，行李刚好搬进寝室，又由原挑脚急忙搬出学堂”。

就这样，郭沫若的参军热在一天之内化解了。郭沫若还说：“这样滑稽的一幕，我并不想把它当成忏悔的资料。这只表明着当时一般青年少年的心理。”

虽然，毛泽东与郭沫若对于辛亥革命的认识上有着很多一致的观点，也都为着这个革命运动的发展兴奋欢呼着，然而，认识的发展路线却不同。毛泽东是个勇于实践的‘秀才”，真的参了军；郭沫若则因了怕苦畏难而放弃了真正的‘实践”。因此，毛泽东最终能够成为一个政治运动的领导者，成为战争的实践者，而郭沫若最终也还是拿着笔杆子批判旧世界了。

就在湖南起义军开始招募新兵，扩充军队，准备援救武汉之时，毛泽东参加了湖南的新军。

参军后，毛泽东被编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军营生活过得很呆板。采用日本和德国的步兵操典，每天三操两讲，点名训话。在这里，一切以长官的意志为转移，长官说是黑的，你就不能说是白的，稍有辩解，就会遭到打骂。毛泽东很不喜欢这种生活，但是，为了援助湖北的革命党人，为了推翻清朝的统治，实现五族共和的理想，他坚持下来了。

在军营中，毛泽东天天勤学苦练，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把一些军事常识、基本训练初步掌握住了。他盼望着马上开到武汉去。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只听得左队队长天天喊集结待命，准备随时开赴湖北，却是干打雷，不落雨，喊来喊去，军队还是扎在协操坪按兵不动。其原因是湖南的立宪党人谭延闿担任了湖南都督以后，与湖南真正的革命党人并不一条心，他在政权机构内排挤了大量革命党人，对于湖北的革命党人则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姿态。

当时，新兵每个月有七块钱的薪饷，除了交两块钱的伙食费以外，剩下的钱还不少。毛泽东订了好几份报纸，买了不少新书。毛泽东说：“我成了一个好读报纸的人。”①

这个爱好恐怕终其一生没有改变。1927 年毛泽东带着红军上了井冈山以后，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看不到报纸。他曾多次写信给中央和李立三，要求代购书报和出版物，信中有“我智识饥荒到十分”；“望得书报如饥似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等语，可见毛泽东渴望了解时事与爱读报刊的心情是多么迫切。1929 年底，毛泽东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在湘赣边界时，因敌人的封锁，曾二三个月看不到报纸，去年九月以后到吉安、长沙买报了，然亦得到很难。到赣南闽西以来，由于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

①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 21 页，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广州的报纸……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状。’① 到了延安以后，毛泽东订阅的报纸就有 40 余种。可见,他是一个真正‘好读报纸的人”。

毛泽东在军营中从当时的《湘汉新闻》上第一次读到了‘社会主义”的名词。那是中国社会党的发起人江亢虎等人在上海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研究”,其实质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杂烩。毛泽东说“: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它经常讨论‘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其实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一些江亢虎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我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只有一位同学回信表示赞同。’② 这里的《湘江日报》是毛泽东误记了,当时还没有这个报纸,他读的应为《湘汉新闻》。虽然,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挑起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响应者寥寥,但‘社会主义’的名词却在青年毛泽东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在后来成为他一生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

毛泽东在兵营中是个不折不扣的‘秀才”,同班长和许多士兵都交上了朋友,经常帮助他们写家信,出主意,他们都很敬重毛泽东的才学与见识。毛泽东说“:在我那个班里,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我非常喜欢他们。其余的都是一些平庸的人,而且有一个是流氓。我劝两个学生参加了军队，我同排长和大多数士兵建立了友谊。我能写，有些书本知识，他们敬佩我的‘博学，。我可以通过为他们写信或做其他这类事来帮助他们。’③

①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 239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6 年版。
②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 21 页,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③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 21 页,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看来，毛泽东给当时在新军里的士兵们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几十年以后，还有新军里共过事的人写信给毛泽东。1949 年 11 月，曾在当时的湖南新军辎重营做过文书的毛煦生就曾写信给毛泽东，希望毛泽东帮助他在北京谋份职业。毛泽东回信告诉他“先生仍以在乡间做事为适宜，不要来京。家计困难，在将来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可能获得解决。”毛泽东在回信中还问起了当年辎重营的营长“尚在人间否”？[①] 可知毛泽东对于那时的同伴仍然萦记在怀。

1912 年春，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和议，南北实现“统一”，一时无仗可打了。毛泽东认为革命已经结束，遂带着茫然的心情离开了军营。

半年的兵营生涯使毛泽东学到了一般的军事常识，特别是了解了旧军队中的一般情形。这大概也为他后来在红军中力主革除旧军队中的一些旧传统、坏习惯，创建新的建军原则打下了一个基础。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351 页，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